

焦點

熱議

薛元興

準確把握大灣區「四維度」「五地位」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昨日在京舉行首次會議，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作為小組組長作了重要講話，港澳特首亦第一次以成員身份參與到國家層面的建設領導小組，這都充分體現了中央對港澳特區的關心與重視。值得注意的是，韓正副總理首次對大灣區建設作了發展的定位，提出了把握「四個維度」、建設「五個戰略地位」。這將是香港未來發展以及積極融入國家大局的重要指南，全社會都需認真了解學習，把握機遇，通過推動自身的發展以助力香港及國家的發展。

規劃調整適應新政經形勢

去年七月一日，習近平主席在香港發表重要講話。習主席說，香港經濟發展面臨不少挑戰，傳統優勢相對減弱，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習主席提出支持香港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發展戰略中發揮優勢和作用。同日，發改委及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一年來，在習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下，中

央相關部委及粵港澳三地政府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取得良好進展。不僅大大提升了香港社會對未來的信心，同時也極大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香港再次成為全球矚目的發展引擎。

對於大灣區應如何定位、如何發展，社會有不同的意見，也高度期待中央的規劃綱要能適時出台。港人的期待與焦慮完全可以理解，但需要明白的是，大灣區建設並非香港一地的規劃，而是涉及多個重量級城市的區域性總體規劃，也涉及多個法律制度、關稅制度的協同發展，難度極大。更重要的是，過去兩個月來，美國挑起了貿易戰，國際政經形勢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大灣區規劃也需適應新的環境而作出相應的調整。同時要指出的是，與以往港人所熟悉的「發展規劃綱要」不同，此次會以「成熟一項推一項」的做法，一步一步穩紮穩打推進灣區建設。做法以及步驟及程序皆有所不同。

但不論如何，昨日小組會議正式舉行，更開放予傳媒進行了長時間的拍攝報道，以如此高規格的國家規劃會議而言，此舉是非常罕見的，這也是中央對大灣區建設、對港

澳特區重視與關心的又一體現。而其間國家領導人講話中更是傳遞了多重重要之信息。

首先，韓正指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重點把握「四個維度」。一是推動高質量發展、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二是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構建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建設高水平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區域；三是優化區域功能布局，把珠三角地區做強，帶動周邊地區發展；四是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為港澳發展注入新動能，為港澳居民特別是年輕人的發展拓展新空間、新機遇，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

這四個維度，並非簡單的「歸納總結」，而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對大灣區建設作出定位。當中有多个關鍵詞：「高質量發展」、「國際接軌」、「優化區域功能布局」、「「一國兩制」新動能」，涉及到發展的目標、發展的方向、發展的路徑，以及發展的要求。香港特區應當在其中看到，大灣區絕不僅僅是一個「支持港澳」的經濟發展規劃，而是一項推動國家發展邁向更高層次的戰略性規劃，香港固然會因此受益，但更要為推動國家的各項發展作出貢獻。因此，對

於港人來說，眼界要放寬、眼光要放遠，切勿以為香港不能做「主角」，實際上香港仍然是大灣區發展的一個「軸心」。

其次，韓正指出了大灣區的「五個戰略地位」：第一，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有體制活力，亦有產業支撐，充分發揮港澳自由開放經濟體，與廣東改革開放排頭兵的優勢；第二，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瞄準世界科技和產業發展前沿，建成全球創新高地；第三，「一帶一路」建設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對接融會的重要支撐區；第四，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載體；第五，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大灣區將是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是高質量發展典範。

大灣區是未來發展動力

這五個戰略地位，實際上是對包括港澳在內各城市的發展要求。當中涉及的幾個關鍵詞如：「世界級城市群」、「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對接融會的支撐區」、「深度合作

應對貿易戰 港不能埋首沙堆



議論風生

陳文鴻

金融危機從來都是以周期規律演變。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金融海嘯，2018年似乎是另一場危機爆發的時間。過往的危機具體觸發點可能不同，但規律的機制一樣，都是從美元的泡沫開始。泡沫支撐不了便爆破，把形成泡沫的資產價值抹掉，同時因金融對實質經濟的關連，以及市場心理預期驟變，連帶打擊實質經濟。越是與美元和國際經濟結合度高的國家和地區經濟，越是受打擊大。美國及美元作為危機的根本源頭，利用各種金融手段和政治措施，卻可以把大部分的風險和打擊轉移至別國。結果其他連帶受打擊的國家，損失可能比美國更大，美國甚至可藉此發危機財。在美國和美元的霸權底下，也沒有金本位的制約，這似乎變成金融危機規律下的一個子規律。

雖然中國金融體制還未完全對美元及國際體制開放，不容易被捲進金融危機的中心去。但中國金融開放度不擴闊，對國際貿易的倚重也高，不可能不受衝擊。關鍵在於危機到來時，中國的金融與經濟政策是否應對得宜，也即是關門和抵銷的舉措是否及時和足夠。中國應對危機不能單靠關門，關門只是暫時的應急措施。以中國經濟的規模而言，發展從來都依靠國際市場各方面的因素，金融、經濟也與地緣政治，乃至恐怖主義關聯結合，中國不能獨善其身。因而，在危機中，中國還要有一套在國際上的應對措施，用進攻來作最佳的防守，也聯合更多的國家來一起解決紓減危機的衝擊。

這次土耳其的貨幣大貶，或許

與希臘國債危機相像，但多了一重美國貿易制裁，也在國際上與美國貿易制裁中國、俄羅斯、伊朗等連在一起。過往危機美國只在美元供應上做動作，今次在總統特朗普主持下，多了強美元以外的貿易關稅攻擊，甚至大有可能在對俄羅斯、伊朗的不合理制裁下演變為經濟戰。土耳其實際上已向美國以經濟戰相對，金融危機連接上美國推動的貿易與政治衝突，不可能像上幾次金融危機那樣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替美國出面來平息危機，當然在平息中是以美國最小損傷為目標。最近我們只見到美國特朗普政權到處挑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似乎被擱在一邊，噤口不語。可見今次金融危機的情況大不如前。若美國特朗普政權所遂所圖達不到的話，危機可能會進一步拖延下去。由此而產生更大的滾雪球作用，衝擊更多的國家與經濟。

在這樣形勢之下，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國際金融中心，難免受連帶影響。也由於香港是中國在國際金融和貿易上的一個連接口和窗口，中美衝突必然反映在美國對香港的各種壓力。

香港該怎樣應付呢？香港股市、人民幣離岸中心以及港元都與內地經濟緊密結合，面對國際危機的連帶衝擊，特別是美國已採取和可能採取的各種制裁針對中國的主要企業和貿易，特區政府實在需要與中央政府作緊密協商和配合。特區政府應該由財政司司長領導一個協調小組來定出一系列應對方案與措施，並與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直接聯繫。現時貿易戰有機會演變為經濟戰和新冷戰，香港不可能不積極應對，更不能埋首沙堆。中央政府從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層面，也應督促特區政府積極和主動應對。

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

貿易戰對中國經濟影響有限



學者論衡

劉遵義

當前的貿易戰對中國經濟有什麼影響呢？有分析表明，儘管它給經濟帶來的直接影響肯定是負面的，但實際上卻很小，還不到GDP的0.5%。

然而，即使對中國來說直接的經濟影響也許是可控的，但貿易戰本身卻有可能損害中美之間的長期關係，包括影響涵蓋教育、旅遊的服務貿易在未來的增長速度。美國在服務領域一直擁有龐大的、不斷增長的順差，中方估計這一順差在2017年達到540億美元，美方的估計是400億美元。貿易戰最大的影響，也許將遠遠超出眼下直接受到影響的貨物。

不過最先的直接影響是：對美國進口商來說，由於不具備消化關稅成本的利潤空間，因此，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產品的新徵稅清單將導致從中國進口的大部分商品變得過於昂貴。這些關稅如果全面實施的話，有可能使相關的中國對美出口完全停止，其金額也許達到2500億美元。

這將對中國經濟產生什麼影響呢？首先，作為和美國一樣龐大的經濟體，一直以來中國相對不怎麼受外部的干擾。過去40年中，雖然中國進出口的增長速度與其他所有經濟體一樣有起有落，但中國實際GDP增長率卻保持了相對穩定，事實上一直在正增長。

此外，過去十年中國對出口的依賴已經持續減弱。商品出口佔中國GDP的份額從2006年高峰時的35.3%降到2017年的18.1%。特別是對美國的商品出口，已經從2006年高峰時佔中國GDP的7.2%降至2017年的3.4%，下降了一半以上。

出口不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相反，今天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是國內需求，是由家庭消費、基礎設施投資和公共產品消費來拉動的。

中國受美國新關稅影響而減少的這部分出口會佔到GDP的1.7%。這一下降程度雖絕非等閒，但總體上是可控的。即使

受到新關稅影響的所有中國對美出口都停止，並且這些商品不再出口到其他國家，中國GDP的減少也不會超過1.12%。在這種情況下，原先預期6.5%的年增長率會降到5.4%，但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18年全球3.9%的平均增長率相比，這個增長速度仍然相當可觀。

須注意美長期發展動向

重要的是我們要注意到，有兩個重要的長期發展動向將同時發揮作用。

首先，貿易戰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實並不在於貿易本身，而是中美兩國之間的經濟和技術優勢之爭。這場競賽無論是明是暗，都不是從唐納德·特朗普總統開始的，而且就算他離任也不會消失。「亞洲再平衡」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這兩項旨在遏制中國的政策都是在巴拉克·奧巴馬總統當政時期提出的（但看來已經被特朗普總統拋棄了）。

這場競賽有可能帶來富有建設性的結果。例如，製造最快超級電腦的競爭讓兩個國家生產出了更好、更快的超級電腦。美國的超級電腦IBM Summit目前是世界冠军，而中國的神威·太湖之光是在2016年和2017年的冠軍，而且全部採用的是中國自己設計的晶片。不過，科技戰爭也可能使市場日益孤立，從而扼殺創新。

第二個長期發展動向是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民粹主義、孤立主義及保護主義情緒上升，這也會對國際貿易和投資產生重大影響。唐納德·特朗普總統並不是這種情緒的始作俑者，但他能夠極其有效地挖掘和利用它們。

貿易戰的最大問題是沒有真正的贏家。由於雙方面臨的可能選擇都減少了，因此是雙輸。兩國出口商都將受到傷害，因為它們的出口下降了，而兩國進口商的業務也會下滑。兩個國家依賴進口商品和原材料的消費者和生產者也將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價格。一場大貿易戰即使持續時間不長，也深具破壞力，因為它會給未來的貿易與投資決策帶來大量的不確定性。更何況，如果協議能輕易被推翻，條約能隨便被撕毀，那麼長期協議也就毫無可信度或

作示範區」、「優質生活圈」。群、中心、區、圈……這就是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願景，也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動力與引擎所在。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提出、親自部署的國家戰略，是國家新時代對外開放的新舉措，也是推進整個大灣區建設、為整個大灣區謀福祉的重要舉措，同時推進「一國兩制」發展。林鄭月娥昨日在發言時表示，建設大灣區的目的，是要發揮粵港澳綜合優勢，深化內地與港澳合作，進一步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支撐和引領作用，支持香港和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增進香港和澳門同胞的福祉，保持香港和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這是對大灣區建設的一個較好理解。

總而言之，在具體措施全面出台之前，香港各界須全面深刻地領會韓正副總理關於大灣區建設的「四個維度」與「五個戰略地位」，這對推動港人贏得未來機遇、推動香港社會跨越式發展、貢獻國家建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貿易戰牽動世界政經變局的當下，香港社會尤其要有更主動與積極的態度。

用處可言了。

縮小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更好的方法，是美國增加對中國的商品和服務出口，特別是新開發的商品及服務，如食品、能源等。中國對食品和能源的需求會持續保持旺盛，並且會在很多年裏呈現出增長勢頭。這些交易將導致美國的GDP和就業以及兩國的經濟福祉出現真正的增長。

貿易戰什麼時候結束？

美國對華服務出口的另一個快速增長點是教育和旅遊業。中國留學生（目前共35萬人）和赴美遊客的支出一直在快速增長。而且，他們來到美國可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促進長期關係的改善。美國在華學生和遊客也可發揮同樣作用。

貿易以及文化、教育交流，有可能進一步促進兩國之間的經濟依存。中國會成為美國能源、食品和教育服務出口的最大客戶，美國在這些領域則可能成為中國最重要的供應商。兩國都是贏家。

由於貿易戰實乃雙輸，所以盡快結束貿易戰符合中美兩國的利益。然而，在美國11月6日中期選舉之前結束貿易戰的可能性不大，因為特朗普總統需要宣布他已經在貿易戰中獲勝。同樣，國家主席習近平也要堅持讓中國不屈服於美國的壓力。

中美關係中還有某些長期的潛在力量在發揮作用。我們可以假設中美之間正在進行的競爭，無論友好還是不友好，都會長期存在下去，而預測這場競爭最終如何了結是很難的事。

大概除了美國以外，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都會繼續維護WTO框架下的現存多邊貿易體系，因為這些國家都曾經並將繼續從中受益。

儘管存在着不確定性和緊張，但進一步加大中國和美國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是符合中美兩國人民利益的。

註：本文獲「中美聚焦網 Chinausfocus.com」授權轉載，原題為「貿易戰會給中國帶來多大傷害？」

香港中文大學藍鴻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美國史丹福大學李國鼎經濟發展講座榮休教授



知微篇

周八駿

2013年11月，為在香港籌備一個公開論壇，我接待了一位從內地到美國留學並長期遊走於美國和歐洲的學者，他向我說了令我至今不忘的話：「西方社會越來越多人承認低估了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成就，因此，越來越多人開始對西方國家幫助了中國發展感到後悔。」

幾乎同時，一位在香港的外籍朋友邀請我出席一個活動，我因忙於籌備那個論壇而婉拒。那位朋友問我論壇主題是什麼？我答：「是『世界格局與中國未來』。」對方立即回應：「中國最好維持現狀。」

來自不同渠道的這兩則信息，拼成一幅圖畫——在西方，人們開始憂慮中國發展，不希望中國進一步發展。

西方有人憂慮中國發展

但是，聯合國2014年7月發表《千禧年發展目標2014年報告》（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4）稱，2010年全球極度貧窮人口為12億人，中國佔

12.8%。按聯合國標準，極度貧窮人口是指每日每人依賴不足1.25美元維持生活的人群。

我的那位從內地留學美國的朋友在美國和歐洲所接觸的；我的那位在香港的外籍朋友每天所接觸的，都是中產階級或以上人士，他們都不了解每天依靠不足1.25美元維持生活的人們是何等的苦況。如果在他們的視野裏經常出現那一類人群，而知道中國擁有僅次於印度的貧窮人口，那麼，他們對中國發展的觀點是否會修正呢？有些人會，但有些人不會。不會的，是因為根深蒂固的偏見。

2010年5月，美國總統奧巴馬接受澳洲電視台專訪時稱，如果10億多中國人也過上與美國和澳洲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這就是西方社會所存在的一種對中國的偏見。為什麼奧巴馬不說為了讓地球能夠承載全人類共同富裕、已然富裕的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應當在環保和節約資源上做更大貢獻呢？

中國領導人承擔着領導中國的重任。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2015年12月7日，新華

社授權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到2020年按中國現行標準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必須繼續發展，不能維持現狀。

2020年中國即使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仍明顯落後於發達國家。2050年中國即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只是達到發達國家水平、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國人民前進的腳步和設定的目標是如此合情合理，為什麼美國和西方國家某些人不容忍和不容許？！

人類不是動物，人類社會不是森林。「弱肉強食」是森林法則，21世紀人類社會應當全面實踐聯合國憲章所記載的原則。

香港從1841年1月至1997年6月30日是英國管治，服膺西方。在香港主流社會尤其上流社會，至今流行西方對中國的偏見。即使在所謂「建制派」中間，迷信西方的不乏其人。香港應當糾正對國家的偏見，糾正對國家的偏見必須從香港主流社會做起。

當前，香港對國家的偏見表現在以下三

方面。

（一）視《基本法》第23條為洪水猛獸。反對派是公開反對為維護國家安全立法。不少香港居民是對國家有偏見而顧慮落實《基本法》第23條。

（二）不敢批評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香港的自由港地位成不了迴避美國對華貿易戰的避風港，也就不能以維護自由港地位為藉口來逃避同內地一起反擊美國對華貿易戰的責任。

（三）無視二次大戰結束以來以及「冷戰」結束以來所分別形成的國際秩序正發生變革，而繼續泛泛而談香港同國際接軌。即使在美國和歐洲，越來越多精英分子不贊同籠統地維護國際秩序。但是，香港一些精英分子仍然慣性地稱，香港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接軌是香港相對於內地的優勢。

港人需站在國家一邊

特區政府應當引領香港社會糾正對國家偏見。本屆政府所面對的是前幾屆政府都未

曾遇的形勢——世界大變局、國家大發展，相應地，香港必定大變化。傳統管治經驗和作風遠不足以應對當前和今後的局面。

以落實《基本法》第23條為例。的確，近期啟動相關本地立法程序，社會政治對立和分化必定加劇。但問題是，何時出現社會和諧而有利於相關本地立法？按目前客觀形勢來推斷，一味等待，將遙遙無期。而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所面對的風險在日積月累。請看：香港外國記者會居然為「香港民族黨」召集人搭台鼓吹「港獨」、攻擊特區政府依法禁止該團體運作，可見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力量何等軟弱。

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必須明白，當前和今後相當長時間裏，繼續實踐「一國兩制」，必須全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否則香港穩定繁榮無從談起。

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須明白，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又同西方世界有千絲萬縷聯繫，無法躲避中美關係惡化；政府必須引導大多數香港居民站在國家一邊，否則，將陷入管治甚至憲制危機。

資深評論員、博士